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哲学成因

万智炯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0)

大众文化是在当今的中国学界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它能够吸引众多目光,一是它所席卷的范围很广,二是它的出现昭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危机。我们要分析一下大众文化的特点与成因,最终找出它之所以存在的深层原因和哲学层面的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大众文化以其强有力的胃口,将各种文化形态统统消化,然后五颜六色的展示在观众面前,供他们像参观动物园一样慢慢的评价,或得一种表层的窥视快感。在一定程度上,大众文化将包括精英文化在内的各种类型文化用最速冻的方式,突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们有一种补偿和占有的快感。正是大众文化的不可确定的表象,使很多学者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定过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都十分深刻的话。”^[1]

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大致说来有这么几种: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普及的、面向工农兵的大众文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的统治权威,制造大众的虚假的需求,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商业消费文化,即那种用于大量消费的,为商业目的“有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这些褒贬不一的观点将大众文化的面目弄得十分的模糊。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多半也是从上面这些观点阐发出来的。

表扬它的人们是从大众文化能够消解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的。中国大众文化刚刚盛行的时候,它用特大型染缸的姿态,把各种声音包装在它的华丽外壳之下,让民众有了一个选择权,有了一点自由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大众文化还在客观上做了一些精英文化想做而没有真正做成功的事情,那就是启蒙,尽管主观上,它并没有这个意思。其实“启蒙”二字在中国知识界嚷嚷了很久,并逐步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已经是由一剂神话解毒剂蜕化成一个更大的神话毒药。大众文化于不经意间将选择权交给了民众,以很低的姿态告诉了大家:你们可以爱干啥干啥,你们是生而自由的,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尽管大众文化最终使以消费为目的,但它在运作过程中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众生平等的真理。所以,基于这个理由,人们认为大众文化功不可没。

可是,随着意识形态问题的日益稀释,管制的渐渐松绑,大众文化的这个启蒙行为渐渐失去作用,而它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弊病就被人们一一列举出来,试图找到对策。人们从大众文化本身的“他律性”出发,动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种种理论,试图给大众文化号脉,开几个药方。一般说来,人们对它有这么几个看法。它的商业导向,“他律性”问题始终是与精英文化的“自律性”相为矛盾。对他而言,市场导向才是大众文化发展的方向,利润是前进的动力。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的活动。市场的需要是它的唯一标准。而且它也从从不创造标准,在这里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创造性可言的。因此,这种文化必然是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它只有一个忧虑就是担心不能被大规模的复制和消费。在考虑大众文化的市场需求时,所谓的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复制不是从头到尾一成不变的复制。“包装”是一个迎合观众心理的有效营销途径。经过“包装”文化能从表面上的热闹平庸变得更能使观众赏心悦目,更能获得“有品位”的称赞。

大体上说来,无论是反对的一方抑或赞成的一方,都是从大众文化的最终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来评价这么

一种现象。无论褒或是贬,统统流于就事论事,没有从根本上来审视一下大众文化,到底是如何得来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在好坏这个层面上来观察事物,是很难面对事物本身的。必须找到一种较为深刻而又科学的研究大众文化的途径。

胡塞尔在1907年的《现象学的观念》中提出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用他的现象学理论认真详细的阐述:如何才能真正的在“看”、“在直观”中把握到事实本身。对于上面所提及的论争的种种问题,用胡塞尔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自然思维态度所能抵及的地方,“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的直观和思维面对着事物,这些事物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形式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但认识的可能性处处陷入了迷宫。如果我们精通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精确发展了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我们可以肯定拥有客观真理,它通过可靠的、真正切中客观性的方法得到论证。但只要我们进行反思,我们就陷入迷惘和混乱之中。我们纠缠在一些显然不利的和自相矛盾的境况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倒向怀疑主义的危险,或者稍好些,倒向怀疑主义各种形式中某一形式的危险,但这种形式的共同特征可惜是同一种东西:荒谬。”^{[2] (P34-38)}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派,明确的反对这种没有反思就进行研究、不从最根源处来把握问题的方法,我们对待大众文化的争论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其好坏的评价上,那么就是胡塞尔所强烈批评的那种类型。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对此,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派提出了哲学的思维态度,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的思维态度,这是种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它宣称:“无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所以‘描述性的现象学’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不过,我们所谓描述和植物形态学之类的处理方法不同,现象学的‘描述’含有一种禁忌意义:不允许不加展示就下定义。描述性本身就是逻各斯特有的意义:从被描述的东西的实是出发,从现象实情出发进行描述。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3] (P40-41)}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就不应再匆匆忙忙的给大众文化下定义,还是认真回到事实本身,将大众文化的本质展示给大家,在展示的过程之中来澄清自己。

大众文化展示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大众,大众的生存本质。真正来说,大众文化的各种文化表现,根源于大众的性质,是大众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根本。那么,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大众,好让大家明白大众文化的哲学成因。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曾这样定义它:大众的概念是数量上的和视觉上的,大众是平均的人。在这方面,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转换成一种量的决定因素。它也就变成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既彼此没有差别的人,却又在他自己身上重复出现的种属类型。通俗的说,大众的一般形成意味着,在那些个体中构成大众的欲望、思想和生活方式方面是别无二致的。^{[4] (P42)}

奥尔特加还没有从根源上说清楚大众到底是怎么回事。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里曾经极大的关注过此在生存的本质,详细的谈了他人的共同此在、此在的沉沦与超越等问题,实际上就已经为将这个“大众”的问题,明白的展示了一遍。他对“众人统治”的揭示就是大众的形态。人们在日常中基本的生活方式就是沉沦,大致的表现是闲谈、好奇和两可。

事实上,大众正是在这几种状态中生存,正是这些才构成以后大众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结果。人们在闲谈之中,“对所谈及的存在者不甚了了,……人们的意思总是同样的,那是因为人们共同的在同样的平均状态中领会所说的事情……关键的只是:言谈了一番。只要是说过了,只要是名言警句,现在都可以为言谈的真实性和合乎事理担保,……平均领悟从不能够断定什么是原始创造原始争得的东西,什么是学舌而得的东西。……谁都可以振振闲谈。……对这种无差别的理解力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深深锁闭的。”^{[3] (P168-169)}正是如此,大众文化才能够在形态上表现为各种各样,将五花八门的东西不加批判反思的加工出售,赢得了市场反响和丰厚的利润。大众文化正是类似闲谈一样的东西,总是在潮流上谈着某些东西,但对这些东西的关注也仅只限于表层,不会深入。

在大众社会里,公众的意见也就决定着我们应该怎样看。公众的看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好奇。这个特征

十分重要,对我们从原始来理解大众文化的诸多表现帮助甚大。海德格尔说:“好奇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物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又跳到另一新奇上去。……好奇同叹为观止的考察存在者不是一回事,……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3] (P173)}“此在一面期待着切近的新东西一面也已经忘却了旧的。众人闪避选择。众人盲目不见种种可能性;它无能重演曾在之事而只不过保持和接受曾在的世界历史余留下来的‘现实之事’以及残渣碎屑与关于这些东西的现成报导。众人……背负‘过去’的遗物而又不冉认其为遗物;它就这样寻找着摩登的东西。”“没有什么对好奇封闭着,没有什么闲谈不曾领会了的,它们满以为自己正过着一种真实而生动的生活呢。”^{[3] (P391)}人们对大众文化议论纷纷的一个焦点,就可以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里得到启示。褒贬大众文化的人们一直为一个问题争论:赞同的人们说大众文化从来包罗万象,不断变化自我,从来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而反对的人们说大众文化永远是资本家的玩具,用一些可怜不变的小伎俩来博取大众的同情和金钱。其实,大众文化的这些特性不是由启蒙家或者是资本家造成的,其根源还是大众的这些特性,正是“此在的沉沦状态”才是大众文化特征的根源。海德格尔的“好奇”说就能很好就这个争的不可开交的问题转换一种视角,为什么不跳出“启蒙或者欺骗”的圈子,从更原始的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呢。尝试着从“此在沉沦”的角度这就清晰了很多。

海德格尔正是把大众看成是日常此在,他们不作为自己本身存在,此在消散在他人之中。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他人从此在身上把存在拿去了。……这些他人不是确定的他人。与此相反,任何一个他人都能代表这些他人。……人本身属于他人之列并巩固着他的权力。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情形,而这样的‘他人’……就是众人……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动用沟通消息的设施的情况下,每一个他人和其他人一样。……众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3] (P175)}

在这种沉沦状态中的此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众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众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判断;竟至众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一切人都是这个众人,就是这个众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平均状态是众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的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的压住。一切原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了。公众意见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对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而这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水平与真货色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众人到处在场,……众人一直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人’。”^{[3] (P276)}

海德格尔的这段论述,将共在的此在的生存状况,也就是沉沦状态详细、明确的展示出来了,这才是大众的真正的面目,由此,大众文化有了怎样的表现和性质,以及这样的表现和性质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才会表露出来。正是这些后果,才有了前文如此多的人关于大众文化的褒贬评价,但如果离开了对大众的理解和现象学式的拷问,我们不能得出明晰的看法。所以,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从哲学的角度,从根源来看待大众文化的诸多争论,大众文化的研究就能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想为大众文化开出一剂药方,也就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
- [2]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引自《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上海第一版。
-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12月北京第2版。
- [4] 奥尔特加《大众的背叛》,“the coming of the masses”。

责任编辑:王飞